

延安大学学科建设规划项目

陕北民歌研究论集

◎ 刘育林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大学学科建设规划项目

陕北民歌研究论集

刘育林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北民歌研究论集/刘育林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24-07066-1

I. 陕... II. 刘... III. 民歌—陕北地区—文集

IV. J6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382 号

书 名: 陕北民歌研究论集

编 者: 刘育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音乐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0.125 印张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24-07066-1/J·252

定 价: 20.00 元

顾 问：乔建中

编委会主任：刘建德

编 委：郭金保 刘平安

郭必选 刘育林

李延琴 王雪艳

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

——有关陕北民歌研究的思考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陕北民歌作为黄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品种之一，曾因种种原因而比其他地方的民歌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赞誉，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前后，一大批矢志抗日的音乐家相继奔赴陕北延安。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一踏上黄土地，就会被这里的“信天游”和其他各类民歌所震撼。未久，这些音乐家们自发地掀起了一个记录整理民间歌曲的运动。同时，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他们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为很多首民歌填上抗战内容的歌词。鉴于民间歌曲音调鲜明的高原风格和独特个性以及唱词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这些新型民歌不仅在陕北，而且很快在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开来。其中，最有影响的如《拥军花鼓》、《打南沟岔》、《刘志丹》、《翻身道情》、《秋收》、《高楼万丈平地起》、《绣金匾》等。在歌词内容和时代精神的作用下，这些歌曲洋溢着热烈酣畅的生命力量，它们也很自然地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革命民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生产建设如火如荼，但人们却没有因此而忘了那些让人心往神驰的陕北革命民歌。于是，在某些专业团体和音乐界人士的建议下，中央歌舞团决定建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这支合唱队在组建上有一个出人意料之举：即所有队员都必须从陕北人中

挑选,以确保它天然的歌唱风格。而且,一旦组建完成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故土,从头向当地的民间歌手学习。很快地,他们习练好的第一批无伴奏合唱作品就与听众见面了。《三十里铺》、《绣荷包》、《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对花》、《走西口》、《冻冰歌》、《横山下来些游击队》等,一经电台广播和舞台演唱,就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加之,由陕北二人台音乐家丁喜才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学生鞠秀芳演唱的《五哥放羊》,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白秉权等人唱的《兰花花》、《秋收》、《卖菜》、《赶牲灵》、《跑旱船》等,皆风靡一时。陕北民歌因此迎来新一轮的传播热潮,所不同者,这一次绝大多数是传统民歌,它们各以自己蕴涵的永恒魅力,让听众如痴如醉。

“文化大革命”十年,万马齐喑,许多传统音乐品种被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者们摧残殆尽。就在大家处于绝望之际,陕北民歌意外地获得了“解放”。经过部分陕西文艺工作者的一番紧张的编创,1975年夏,也即“四人帮”垮台的前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作品以“陕北革命历史民歌”的名义通过广播而传遍四面八方。对于近十年间在革命大批判的喊杀声和高、强、响的“样板戏”和“战地新歌”中度日子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一下子听到他们一度十分耳熟的“山丹丹”,真如山泉沁入心脾。尽管我们到现在也无法弄清陕北民歌何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获此殊荣,但它无疑也成为这一民间音乐品种在20世纪中国人音乐生活中一段骄人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的不断进步,文化生活的日益多样,原本也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新的勃兴局面出现。然而,也许是大家太急于“现代化”了,厚此而薄彼,传统文化反而在十

余年间受到很大的挤压，在人们未完全觉察的情况下逐渐被边缘化了。自然，陕北民歌也遭遇了以往未遇到的冷落。直到 90 年代后，情形才有所改变。通过媒体、某些赛事以及学术界的推动，王向荣、孙志宽、贺玉堂、赵大地、阿宝、崔胜军等一批新的信天游演唱家相继涌现。他们同时又给听众带来众多脍炙人口的好民歌。《黄河船夫曲》、《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那是一个谁？》、《东方红》、《你把哥哥的心扰乱》等随处可闻，久违的陕北民歌又活在新一代听众的心中了。

总之，从推广和传承的角度而言，七八十年间，陕北民歌竟然掀起四次热潮，这对于一种此前偏于一隅、完全不为世人知晓的地方民歌而言，既值得自豪，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 20 世纪中国民间歌曲的采集记录整理史上，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应该予以认真总结的一个学术经验。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一向重视整理自己文化遗产的工作，并已形成一种优秀的学术传统。诗经、乐府、吴歌、竹枝、时调、粤讴等，薪传不断，代有所积。惟一遗憾的是，这些天籁般的绝唱，均未留下曲谱，从而给后人感受它们的艺术本质，造成难以沟通的障碍。所幸者，这个历史性的缺憾也由抗战时期延安的音乐家们彻底弥补了。

如前文所述，陕北民歌的独特个性，让每一个来到延安的音乐家耳目一新，所以，自 1938 年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成立之日，音乐系老师同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到民间采集记录民歌。他们“眼睛向下”深入民间，从无数民歌手的口中学会那些在这块土地上流传了成百上千年的率性之唱，并将它们以“手工作业”的方式记录下来。对于中国音乐而言，这种直接面对民间歌

手、连词带曲地将民歌记录下来的方式，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一工作从1938年开始到1947年大多数音乐家离开陕北为止，前后有八九年，参与其事者，有包括冼星海、吕骥、李焕之、马可、安波、刘炽、张鲁、关鹤童、李元庆、刘恒之等知名音乐家在内的几百位音乐工作者。所收集的民歌从最初的陕北到其后的宁夏、甘肃、山西等地的千余首不同体裁类型。这一次采集活动时间持续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所记录的民歌质量之高，品种之多，在中国是无先例可寻的。它当之无愧地应当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由音乐家直接参与，对民歌等进行词曲兼顾的田野采集记录，是20世纪具有开创意义、有声有色的民歌运动。伴随着采集工作，音乐家们还组织了整理研究活动。先有1938年的民歌研究会，后有1940年的民间音乐研究会，通过《民族音乐》这一会刊，发表了大家的初步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学术研究的全面展开，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而1953年前后出版的《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约400首）和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则成为这些民歌运动音乐、文学成果的直接体现。

1949年以后，陕北民歌的采集记录正式纳入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中。50多年来，陕西和其他地区的音乐学家对这一地带的民歌进行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跟踪考察。如50年代的“陕北民歌调查小组”、60年代第一次《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的编纂、70年代中国音乐研究与陕西音乐学家对陕北革命历史民歌的再采集，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民歌·陕西卷》的全面展开和最终出版^①，以及2003年4月问世的大型音像合集《中国陕北民歌》等^②，分别记录下50多

年来数以百计的音乐家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其中，刘均平、杨瑾、霍向贵等前辈出力尤多。杨瑾以一人一生之力编纂的信天游选集《露水地里穿红鞋》^⑥，贺艺等主持的《中国陕北民歌》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成为整理信天游的两个很有代表性的范本。这一项工作，与前面的传承推演相互呼应，对陕北民歌的保存、保护、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它们深入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认为，要延续一种活态文化的生命力，必须同时做三件事。一是要为它在原生地的传承创造必要的条件，如鼓励老歌手教传新一代学唱，培养青年人喜欢本地民间文化的兴趣，积极倡导民俗活动的开展等。总之，要努力减少现代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压迫感，尽可能给它较为宽大的生命空间。其次，就是对以往已经获得的资料采用多种方式、手段进行整理，使之进入各种信息载体，成为权威性的民歌储存库。同时，还应该将田野考察工作持续地进行下去，从而获得更多的新资料。最后，就是要强化学术研究工作，总结不同地区民歌的艺术特色，揭示其多方面的文化蕴涵，追溯其悠远的历史踪迹，为全面认识它的文化价值而发挥学术研究的独特作用。

若以这些方面而论，我觉得今后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特别是学术研究方面。我个人以为，与传播、记录、整理工作相比，学术界对陕北民歌的研究不够重视，因而在整体上呈现了滞后的状况。虽然，前辈如何其芳、公木，当代音乐学家、歌谣学家如刘均平、杨瑾、霍向贵、李世斌、王克文、李雄飞等都有专论高见，给当代读者以很多教益，在民歌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公认的与

陕北民歌高度的历史文化价值相称的全面论述这一民间文化宝藏的专著，也没有一份通过现代田野作业的方法，在进行长期深入考察后，将陕北民歌与黄土高原文化融为一体的考察报告。这是为什么？很值得学术界思考，也值得多年来关心陕北民歌，为陕北民歌倾注大量心力的每一位同行思考。也许是在前两方面用力过多而未有余力及此，也许是为这种民歌写出鸿篇巨著的时机未到。总之，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相信，研究这个现象，决不是无事自扰。为了陕北民歌的生存、延续，乃至弘扬，花一些工夫研究陕北民歌的学术研究为什么相对滞后的原因，肯定是划得来的。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民歌，自己的文化，本土人研究本土文化，“当然是最艰巨的”^①，但也是十分有意义而又兴味无穷的。

自然，对于家乡的歌，我们永远都会保持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我们也会不停顿地写出自己对所有出自土地的歌的闻听之感。至少，这本由 14 位作者撰写的 20 篇文章，就是大家的又一份答卷。说不定，它的后面，真的会引出许多部深论陕北民歌的力作。

这是我们的企盼！也是我们奋进努力的目标！

2004 年 10 月 9 日 乔建中
于台湾台南艺术大学
逸园河畔 G2 之一

注释：

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陕西省民歌集成编辑部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该集成共录载陕西民歌 1308 首，是有史以来篇幅最

大的一部陕西民歌选本。

②《中国陕北民歌》贺艺、刘均平等编，中国唱片社出版，2003年，全集包括7张CD、1张DVD，由70余位不同时期的民歌唱家演唱了138首陕北民歌，另有刘均平的一篇论述陕北民歌的长文。

③《露水地里穿红鞋》杨瑾编，该书共辑录陕北民歌415首，为迄今曲目最多的一本陕北民歌选集。

④语见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马林科夫斯基为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写的序言。全段话如下：“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最珍贵的成就。”本人近日精读该作后，感触良多，以为马氏之论意味深长。它直指昔日某些有浓重殖民主义思想的社会人类学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野蛮人”的陋习，倡导“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实际上是社会人类学科观念的一次革命。由于这一思想至今被学界敬重并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故本文借马氏之语拟做标题，以见教于诸方家。

前 言

“陕北民歌是我国惟一走遍全国的民歌。”我国一位音乐界知名学者如此说。我们还可以说：陕北民歌是我国惟一的56个民族都会唱的民歌。夸张吗？不。半个多世纪以来，陕北民歌《东方红》响彻祖国大地，几乎成为第二首“国歌”，有哪个民族不会用自己的语言高唱《东方红》呢？其实何止于此，1970年4月20日陕北民歌《东方红》已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遨游太空了！

1938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的倡议下，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深入民间采录陕北民歌，他们惊喜地发现并在学习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程中开发了陕北民歌这块艺术宝藏。今天，《陕北民歌研究论集》行将出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当年“鲁艺”的老前辈艺术家们，衷心感谢他们深入民间、不辞辛劳，为我们铺出了开发陕北民歌艺术宝藏的坦途。继承“鲁艺”的光荣传统，推动陕北民歌研究，是我们的宗旨。

陕北民歌是陕北黄土高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优生儿”，她既有我国第一部民歌集《诗经》的传统美、五声音阶“清乐”的传统美，亦有着北方兄弟民族的“异质美”。“信天游”那浪漫主义的比兴手法让你展开想像的翅膀，信天游去，你能想像得多美，她就有多美。我们相信一旦有一天陕北

民歌成了你的“伴侣”，你便会永浴于美的海洋。

要不断深入研究中国民歌，必将要借助与其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学科地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工作的必由之路。本论集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用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音系中乐音的带腔性及均分律动的非功能性和大量运用非均分律动的问题。即使一无可取，也可使他人少走一些弯路，何乐而不为。

陕北民歌如同陕北黄土高原下埋藏的天然气、油、煤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欢迎有识之士来“投资”开发！本论集权且算是向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发展献上的一份微薄之礼吧。

刘育林

2004年7月11日

目 录

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

- 有关陕北民歌研究的思考 乔建中(1)
- 前言 (1)
- 陕北民歌合唱队成立的缘起及其历程 王方亮(1)
- 我心中的信天游 乔建中(7)
- 陕北民歌巡礼 刘均平(15)
- 五首同词异曲的《走西口》浅析 杨 瑾(84)
- 从《三十里铺》谈起 杨洁明(104)
- 陕北民歌与陕北方言 刘育林 常 炜(133)
- 陕北民歌旋律与陕北方言声调 刘育林 常 炜(146)
- 论信天游旋律形态的可变性 党音之(158)
- 山曲、信天游的旋律框架及比较 韩 军(169)
- 陕北民歌演唱技巧探究 王新惠(177)
- 民歌岛——“榆林小曲” 刘育林(192)
- 从《骑白马》到《东方红》
- 陕北革命历史民歌说略 安宇柱 刘育林(204)
- “信天游”与“花儿”之比较
- 论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再划分
- 刘育林(220)
- 《五哥放羊》三题 刘育林(233)
- 论信天游的审美特色 王晓平(245)

陕北民歌旋法特征初探	刘建峰(259)
陕北民歌：异彩纷呈的绝唱	杨文良(273)
信天游语言艺术试探	刘育林(285)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上册)	
歌词用字、注音、释义中的问题	刘育林(296)

陕北民歌合唱队成立的缘起及其历程

王方亮

1951年夏秋之交，由国家组织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青联欢节之后又赴东欧等八个国家访问演出，宣传新中国，同时也向这些国家的先进文化、思想、建设以及组织形式学习，时间达一年零一个月。1952年秋回国后，在文化部的倡议下，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于当年12月初，在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基础上又从全国调集了音乐舞蹈方面的专家组建了国家的第一个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同时，歌舞团需要建立一支民歌合唱队。经文化部及团领导商定，由陕北建立为好，原因有三：一是陕北民歌有独特的风格；二是陕北民歌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并且陕北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之一，产生了许多歌颂党和革命的民歌；三是许多老同志曾在陕北学习、研究陕北文艺有基础。为了继承、发展陕北民歌并用多声部合唱形式来发展民歌合唱艺术，陕北民歌合唱队，就这样于1952年底诞生了。

我和张树楠同志受命负责组建这支民歌合唱队，于是，我们便赴陕北地区招生。在陕北地区各级政府、文化馆、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走乡串户去招收那些嗓音条件好并喜爱陕北民歌的青年。最后，在几千名报名者当中选拔了34名青年（其中30

作者简介：王方亮（1928—），男，国家一级指挥，原中央歌舞团团长、指挥家兼作曲家，中央歌舞团艺委会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常务理事。（北京 100044）

名女队员,4名男队员),这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吧!第一批被招收的队员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了北京,12月初参加了1952年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的成立大会,组成了5个业务队之一的民歌合唱队。

学好民歌是打好民歌合唱的基础。招收来的合唱队员,人虽是陕北人,但对陕北民歌所知甚少,因此学习陕北民歌并牢牢地掌握演唱陕北民歌的风格特点应是首要任务。记得中国青年文工团在国外演出时,访问过许多国家的民间合唱团体,他们的队员大多来自民间歌手,每人都掌握了几百首民歌。访问保加利亚国家民歌合唱团时,他们介绍每个队员必须掌握几百首民歌方能入选。根据这一经验,1953年春,团领导决定把队伍拉回到陕北进行培训。我们带上了基本乐理课教员、文化教员、行政管理人员等,到达陕北绥德清水沟,租了10孔窑洞,开始了基本训练。我们请了民歌艺人蒋喜祥、王喜祥、高振林等老师来队教唱民歌。当时规定每礼拜汇报一次学习成果,然后老师讲评。在学习民歌、加强合唱的基本训练期间,其他基本乐理课、文化课均照常进行。在绥德经过半年多的培训,返回北京。回京后,仍与民歌艺人不断保持联系,还经常请他们来京授课。(1956年我们曾再次把队伍拉回到陕北榆林,学习榆林小曲,历时两个月。)

队伍自陕北绥德返回北京后不久,团里举行了一次全团性的、开放性的(请北京音乐界的人士)业务汇报会,民歌合唱队共汇报了三首曲目:1.《三十里铺》合唱曲(陕北民歌,王方亮编曲);2.《对面沟里流河水》合唱曲(陕北民歌,王方亮编曲);3.《对花》(陕北民歌)。当这三首曲目演唱过后,当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陕北民歌所独具的那种艺术魅力及未曾听过的合唱